

---

# 从单核型到多中心： 大都市中心变迁的历史与未来 ——以杭州为例

马智慧 王艳侠

**【摘要】**：城市中心的形成和变化是历史因素、规划引导和当代环境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控制城市单体规模无限扩张，推动多中心发展，建设“郊区新城”，成为新时期国家倡导的城市发展重点。杭州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多中心”发展大都市，可以为审视大都市“多中心”发展提供历史观察、动因解读、趋势展望。现代规划引入和实施前，商业驱动是杭州形成御街“四拐角”和湖滨“新市场”两大城市中心的主要因素；现代规划的导引，推动杭州城市从传统中心向西湖和“多中心”演进；随着互联网、轨道交通和人口的大量集聚，未来杭州多组团、多中心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在“后工业化”时期和数字智能时代，城市的空间形态和产业链形态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创新驱动与文化归属感将成为一个区块发展的核心动力。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公共服务相对集中，交通较为便捷，人文艺术氛围浓厚，社会治理高效的“三生融合”空间，有望成为新的城市中心。

**【关键词】**：大都市 单中心 多中心 规划 未来

马智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期，产业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城市单中心过度集聚将产生边际效益递减，导致“内卷化”现象。20世纪初期，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城市中心的形成和变化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社会”概念提出后，大都市“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发展成为全球范围内研究和实践的重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城市化，催生了一批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截至2019年底，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已达6个。由于大都市“摊大饼”扩张，城市中心人口密度总体偏高，单中心“城市病”不断加剧，郊区化现象出现，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成为发展趋势。城市中心的转移是一个历史过程，当代的“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趋势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交通变革和人口流动的加速，使得“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发展更多变数。《浙江学刊》关注大都市多中心化这一热点问题，以具有较强代表性的“新一线”城市杭州为案例，推动跨学科对话，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大都市多中心化的历史过程和驱动因素，并在未来的实践中，更好地引导多中心化发展。

王艳侠：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认知和解读城市发展的规律，需要跳出某一个专业的视角，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去把握。以往审视大都市多中心化，我常以自己所学的经济管理专业和发改部门的视角去分析，今天能够开展一次跨领域的交流，感到非常意义。也希望通过这期对话，能够为城市研究、城市治理甚至老百姓的就业居住带来一些启发。

## 一、从御街“四拐角”到湖滨“新市场”：商业驱动下的杭州城市中心转移

马智慧：杭州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发现，证实杭州有8000年文明史；而被誉为“中华第一城”的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则实证了杭州的5000年建城史。杭州虽然历史悠久，但很长一段时期，受钱塘潮的影响，城市建设的基础条件并不理想，城市中心的形成和变化也随自然和人工环境共同作用而变化。

---

王艳侠:是的。公元前 222 年,秦置钱唐县,属会稽郡。彼时,杭州东临海湾,属潮间带,湾内泥沙淤积,至汉代形成沙洲浅滩。东汉时,郡议曹华信在县东筑大塘,阻挡咸苦海潮,县境蒙利,为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条件。秦汉时,杭州为钱唐县,南至五云山麓江边徐村、范村一带,西北抵石人岭和西溪,东界宝石山麓大佛寺附近,县治在灵隐山下,乃“山中小县”。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钱唐县升为临江郡,是为郡级政区之始,不久即废。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年),又置钱唐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平陈,改钱唐郡为杭州,“杭州”之名自此始。开皇十一年(591年),大臣杨素于凤凰山麓的柳浦筑杭州城垣,是为最早的杭州城。因钱唐湖位于杭州城之西,“西湖”之名沿用至今。隋大业六年(610年)开凿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南端的终点和东南交通枢纽。唐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王朝。为避国讳,四年后将“钱唐”改为“钱塘”。唐代,杭州城区从凤凰山下延伸至武林门一带,人口从隋 15000 户增至 86000 户,成为东南重要城市。但彼时杭州仍北不及苏州,南不及越州(今绍兴)。

马智慧:吴越国时期是杭州城市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不但奠定了杭州“东南第一州”的地位,还为杭州获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嘉誉提供了基础支撑。吴越国时期及其后杭州城市中心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艳侠:至吴越国,杭州才一跃而为两浙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杭越易位”,北与苏州并驾齐驱。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载:“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吴越国奉事中原、保境安民的国策,为杭州发展创造了和平环境。

杭州城规模在吴越国时期大大拓展。钱氏大规模拓展杭城有三次。一是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拓隋唐旧城,筑新夹城。钱俨《吴越备史》载:“环包家山,泊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焉。”二是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新筑罗城。《吴越备史》载:“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泊钱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罗城共有十座城门,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因城形“南北展而东西缩”,形似腰鼓,故称“腰鼓城”。三是后梁开平四年(910年),扩建罗城三十里,主要是扩展旧城东南部。此外,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又开慈云岭,建西关城。为适应城市规模扩大后人口集聚和生活需要,在城内掘池引水,凿井利民,并整治桥梁、市场、房舍,工商业逐渐繁盛。至此,奠定了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基础。南宋定都临安,杭州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都会,人口达百万之多,城区东南至钱塘江,西南至六和塔,西至天竺、灵隐,北至西溪、武林门。元、明、清三代,杭州作为省城,城市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千余年来,西湖、御街、中河、东河、贴沙河构成的古城格局基本稳定,城市中心因商业定格在御街与河坊街的“四拐角”处。

马智慧:近代以来,中国众多城市兴起了新的商业中心。随着城墙的拆除和汽车交通的兴起,传统的政治、商业中心区,向新式商业和产业中心转移。杭州的情况是否也如此?

王艳侠:这个话题要从西湖和“湖滨”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湖滨”在古代杭州一直是一个城市“次中心”。

马智慧:这个“次中心”是如何形成的?

王艳侠:南朝宋刘道真《钱塘记》记载,华信筑堤时与百姓约定,“有能运土石一斛,即与钱一千”,于是,“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据学者考证,华信筑堤原址位于如今西湖的东岸,即今湖滨一带。湖滨的开发直接促成了隋代大运河在杭州城区的线位。当时,随着西湖以东地区沙涨成陆,可开发的荒地沙田越来越多,为了给开发湖东荒地提供水源与交通条件,大运河的杭城段放弃了绕西湖环岸的水道,改为北起宝石山东麓、南抵吴山东麓的南北向近直线水道,由凤凰山东麓的柳浦汇入钱塘江。因为河水引自西湖,清澈见底,这条于大业六年(610年)十一月凿通的水道被称为“清湖河”(南宋称为“西河”,后改称“浣纱河”)。在沿清湖河一线出现了许多居民聚落,湖滨形成规模,使过去杭州南北分隔的宝石山麓聚落与吴山东南麓聚落逐渐相连,杭州城区慢慢扩大,开始了向北、向东发展的趋势。

---

到了唐代，城市居民的用水问题日益凸显。作为“江海故地”，杭州的土地碱性很重，缺乏淡水水源。唐建中二年(781年)至兴元元年(784年)，杭州刺史李泌开相国井、西井、方井、白龟池、小方井、金牛井等六井，引西湖水入井，解决居民饮咸水之苦。从南往北，当年的六井入水口依次列于今湖滨一公园至六公园、少年宫一线上。可以说，正是“湖滨六井”的开凿，奠定了湖滨及杭州人居条件的重要基础。唐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在钱塘湖上修筑湖堤，蓄水灌溉。湖堤被当时人称为“白公堤”，其位置大约在今宝石山东麓向东北延伸至武林门一带，南段即湖滨北侧圣塘景区附近，并非今天孤山脚下的白堤。白公堤将当时的西湖分割为“上湖”和“下湖”：上湖即现在的西湖，而下湖早已完全干涸，变为市区。白公堤除了调节西湖水位、帮助灌溉农田外，也是西湖由自然风景向人文景观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为后来的苏堤、杨公堤开创了先例。人文景观特色的塑造，创造了湖城融合的基础条件。

吴越国时期及宋代，湖滨开发较快。当时，西河是西湖的泄水道，又是运河通往市区的河道，在京城内的水利与交通系统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西河环绕下的左三厢，也因水路四通八达而成为全城的核心地带之一。南宋时，湖滨一带虽非商业中心，却是政治、教育与宗教活动中心之一，许多官府建筑都选址于此。为数众多的仓库也是湖滨在整个临安府中政治地位的象征之一。位于黑桥(今板桥路)西侧的左藏库，由韩世忠故宅改建而来，是南宋朝廷最大的财库。位于钱塘门外(大约在今圣塘景区一带)的钱塘正库，是临安府最大的酒库之一。在教育方面，南宋时期的湖滨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国子监、太学、武学、临安三贡院(本州、本路、礼部)之一的本州贡院、别试所等均建于此。

到了清代，杭州城的整体格局发生了一大重要变化，即湖滨一带俗称“旗下营”的杭州驻防营的建立。杭州旗营驻扎湖滨后，这一地区的众多景致被纳入旗营当中，百姓再不可见。清末，沪杭铁路通车，拱宸桥开埠，城站和拱宸桥租界发展为商贸和产业中心。辛亥革命后，阻隔杭州城市与西湖之间的“旗营”和城墙逐渐被拆除，城市与西湖重新“合璧”。湖滨被开发为“新市场”，并取代“四拐角”和城站的地位，成为杭州的商贸中心。

## 二、“三面云山一面城”与“一江春水穿城过”：规划引导下的多中心化

王艳侠：中国古代城市是由具防御作用的“城”和具商业作用的“市”组成的。由于城市格局较为稳定，城市的中心也较为稳定。西方现代规划引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打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西方现代规划有哪些明显的不同？

马智慧：中国古代城市营建具有特殊的法式，城市格局遵循礼制，以方形为主，依形就势，道路走向垂直交叉，城市中心多因政治和商业形成。西方现代城市规划非常关注城市的功能和分区，从而引导城市中心随功能分区而分散开来。

王艳侠：总体来看，历史上的杭州城市始终定位于江、湖之间，东、南受制于钱塘江，西面受制于西湖群山和西溪湿地，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空间格局。这种背山、临湖、倚江的空间格局，一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西方现代规划引入后，如何改变了这一结构？城市中心是如何随之变化的？

马智慧：1927年4月，划定杭县城区及西湖，成立杭州市。此为杭州置市之始。5月，成立杭州市工务局，统筹城市建设，引入西方市政规划，形成行政区、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风景区等功能分区。

王艳侠：“苏式”规划对中国城市规划影响至深。这种以计划为方法、严格功能分区的规划，对杭州城市中心的变化有哪些影响？

马智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杭州先后经历了五轮城市规划。其中，第一轮城市规划(1951-1957年)的“苏式”烙印最为明显。这一时期的规划，最大的特点是“以西湖为中心”，打破“城东湖西”的空间布局，突破旧城范围，在西北面规划文教区，东面和北面规划生活区，增辟艮山门外工业区。

---

王艳侠:我注意到“苏式”规划所形成的中心广场、中心公园,成为许多城市的公共中心。而“苏式”规划对功能分区的严格要求,又进一步强化了“公共中心”的地位。

马智慧:是的。杭州第一轮城市规划的最大作用在于让西湖成为城市的中心。以西湖阮公墩为轴心,空间布局上采用核心中轴放射或环形放射方式,城市公共空间以集中的大绿地广场为特色,工业、文教、风景、居住等4大功能分区之间用干道系统和绿化系统连接。

王艳侠:现代工业在城市中的规模化布局对传统以商贸为中心的城市格局是一次重要的突破。杭州的情形如何?

马智慧:杭州城市中大规模工业布局从第二轮城市规划(1958-1977年)开始。因受“大跃进”的影响,按照“生活服从生产”的原则,突破原有的规划区范围,优先布置工业区,沿运河向北、西湖向西、钱塘江向西南,形成半山、望江门、拱宸桥、古荡和留下、龙山等工业区。除了新兴的工业中心外,杭州城市“向北发展”明显,且以浙江展览馆等“公共建筑”为标志,形成新的文化商业中心。

王艳侠:改革开放后,杭州城市规划和城市中心有哪些变化?

马智慧:第三轮城市规划(1978-1992年)提出开辟“钱塘江边新区”,发展城厢、临平、闲林、乔司、瓶窑、余杭、富阳城关等七个卫星城镇。特别是1992年规划修编提出杭州铁路枢纽由西线方案改为东线方案,新建铁路东站;另行选址新建杭州民用机场;突破430平方公里的市区行政区划范围,划定1047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区,建立以杭州城区为核心,半径35公里,包括萧山、余杭两县(市)的中心城市圈。

王艳侠:这是否可以看成首次立足“市域”理念的多中心发展趋势?

马智慧:可以这么认为。只是当时的新区和卫星城镇还不够强大,对中心城区的疏散功能不明显。

王艳侠:当时一般将副城作为城市中心人口和功能疏散的主要模式。

马智慧:是的。杭州在20世纪末期尝试过副城的规划。第四轮城市规划(1993-2000年)提出从以西湖为核心的团块状布局,转变为以钱塘江为轴心,跨江、沿江多核组团式布局,形成“一个主城、两个副城(下沙城、滨江城)、六个旅游区”的布局形态。因行政区划调整,本轮规划未能进一步实施。但是,城市发展中心转移和多组团的趋势已非常明显,城市“副中心”也第一次出现在杭州城市规划中。

王艳侠:“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未来科技城”等一系列新中心是通过哪些规划形成的?

马智慧:这要谈到第五轮城市规划(2001-2020年)。此轮规划分为两个阶段:2001-2015年;2016-2020年。

第一阶段(2001-2015年)。随着杭州城市化加速推进,特别是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原有的城市空间形态的弊端日益显现,发展空间不足、环境质量下降、道路交通拥堵等现代“城市病”日益加剧。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更新城市空间形态,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在这一大背景下,沿江开发、跨江发展成为必然选择。为破解城市空间拓展战略难题,杭州在新世纪初做出了萧山、余杭撤市设区和编制新一轮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两项重大决策。2000年,提出实施“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杭州发展空间问题,向钱塘江方向拓展空间。以市区为核心,逐步形成包括萧山、余杭、富阳在内的杭州大都市圈和沿杭新、杭徽公路发展的两条城市带,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市县联动,共同繁荣;拓展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启动钱江新城建设,推进城市东扩。萧山、余杭撤市设区后,杭州市区面积由683平方公里扩大到3068平方公里,为拓展城市

发展空间提供了基础。《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杭州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勾画了“一主三副六组团、六条生态带”的城市新格局,推动杭州从“倚湖而兴”向沿江跨江发展、从“摊大饼”向“蒸小笼”、从“三面云山一面城”向“一江春水穿城过”、从以西湖为中心的“西湖时代”向以钱塘江为轴线的“钱塘江时代”转变,构筑“东动、西静、南新、北秀、中兴”的网络化、组团式、生态型空间布局。沿钱塘江规划建设湘湖新城、之江新城、滨江新城、钱江新城、城东新城、钱江世纪城、空港新城、下沙新城、江东新城、临江新城、临平新城、南湖新城、塘栖新城、东洲新城、富阳创新创意产业新城、凤川—江南新城、坪山新城、洋安新城、青山湖科创新城、锦南新城等20多座新城和100多个城市综合体。钱江新城、滨江新城、钱江世纪城都是此次规划导引形成的城市新中心。

第二阶段(2016—2020年)。城市空间发展规划与城市定位和规模密切相关。富阳撤市设区后,杭州对城市总体规划做了一次修编,城市定位为:一基地四中心——以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目标,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山水旅游资源优势,发展科教事业,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本轮修编规划实施过程中,“两廊”发展提到重要位置,即城西科创大走廊、城东智造大走廊。特别是城西科创大走廊,串联起紫金港科技城、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是杭州城西东西向联结主要科创节点的科技创新带,发展势头极为迅猛,尤以未来科技城最为突出,是中国极具潜力的4大未来科技城之一,人口总量从当初6万多务农人员发展到2019年的40多万,25到35岁主力就业人群,平均工资位居杭州前列,新开楼盘屡屡成为限购的“红盘”。

王艳侠:综合分析历次规划对杭州城市中心变化的影响,可以得出哪些思考?

马智慧:现代规划从城市功能的布局着眼,打破了中国古代营城法式从礼制和安全入手构建的城市政治中心格局,也打破了商贸活动成就的城市商业中心,进而打开了城市的发展空间,让城市能够集聚更多功能。人口随着规划和建设不断在新的产业中心和公共中心集聚,原本萧索的城北、沿江等区域因工业和新城变得热闹起来。西湖不再是古代的“城西之湖”,而成为一个景观优美的公共中心,完全改变了更新前的“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现象。当然,现代规划也有不足之处。过度关注功能和分区,产业和居住分割现象明显,通勤需求压力剧增,交通拥堵成为一大顽疾。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规划非常重视自然生态的保护及其功能的开发,正是现代规划推动了西溪湿地区域成为生态型城市新中心。

王艳侠:西溪湿地及周边区域成为生态型的城市新中心也是规划引导的结果吗?

马智慧: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认为。1985年修订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已有“古荡水乡旅游区”,这是西溪湿地首次进入城市总体规划。1993年后,蒋村商住区开发,使西溪湿地范围锐减。1996年5月,行政区划调整后,蒋村南部水网地区再次被规划为“西溪文化旅游区”。2001年11月,启动编制《杭州市西溪风景区总体规划》,将西溪湿地作为一个“风景区”。其后,杭州市以“湿地公园”的理念,将湿地保护与城市开发统筹起来,编制《杭州市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加上后续的详细规划等,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规划范围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湿地公园范围,面积约为10.64平方公里;二是外围保护带,面积约为15.7平方公里;三是周边景观控制区,面积约为50平方公里。在实际保护、开发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核心的生态旅游区,以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为核心的高教研发区,以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浙大国家大学科技园为核心的创新创业区,以及大片新兴的住宅集聚区。“湿地公园”这一关于湿地保护模式的规划理念变革,构建出一个“金镶玉”的保护、开发体系,最终实现了“游在西溪、学在西溪、住在西溪、创在西溪”的城市新中心要素支撑系统。

### 三、互联网、轨道交通与人口:城市中心的未来归属

王艳侠:历史上的杭州城市中心区,从“四拐角”到“新市场”,从西湖到钱塘江,从老城到新城,从商业驱动到规划引导,具有因素“多元化”、发展“多中心化”的特点。“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创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由于空间经济的自组织特征,新的城市中心一旦形成,将通过自我强化获得成长,而最初的自然、区位和集聚优势会变得不再重要。如此而言,城市新中心是否会“固化”下来,抑制“多中心化”的发展?

马智慧:可以通过下面这几张图(图 1)更直观地看到杭州城市中心的变迁情况。从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来看,任何城市的中心都不具备长期的稳定性。在工业化早期,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形成“城市中心区”。随着中心区人口和功能过密,成本抬升和品质下降,郊区化成为趋势。“后工业化”时期,生产要素、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多元化趋势明显,“新经济地理”成为可能。从“硅谷”到“硅巷”再到“硅滩”,没有一种“固化”的模式可以左右城市的中心归属何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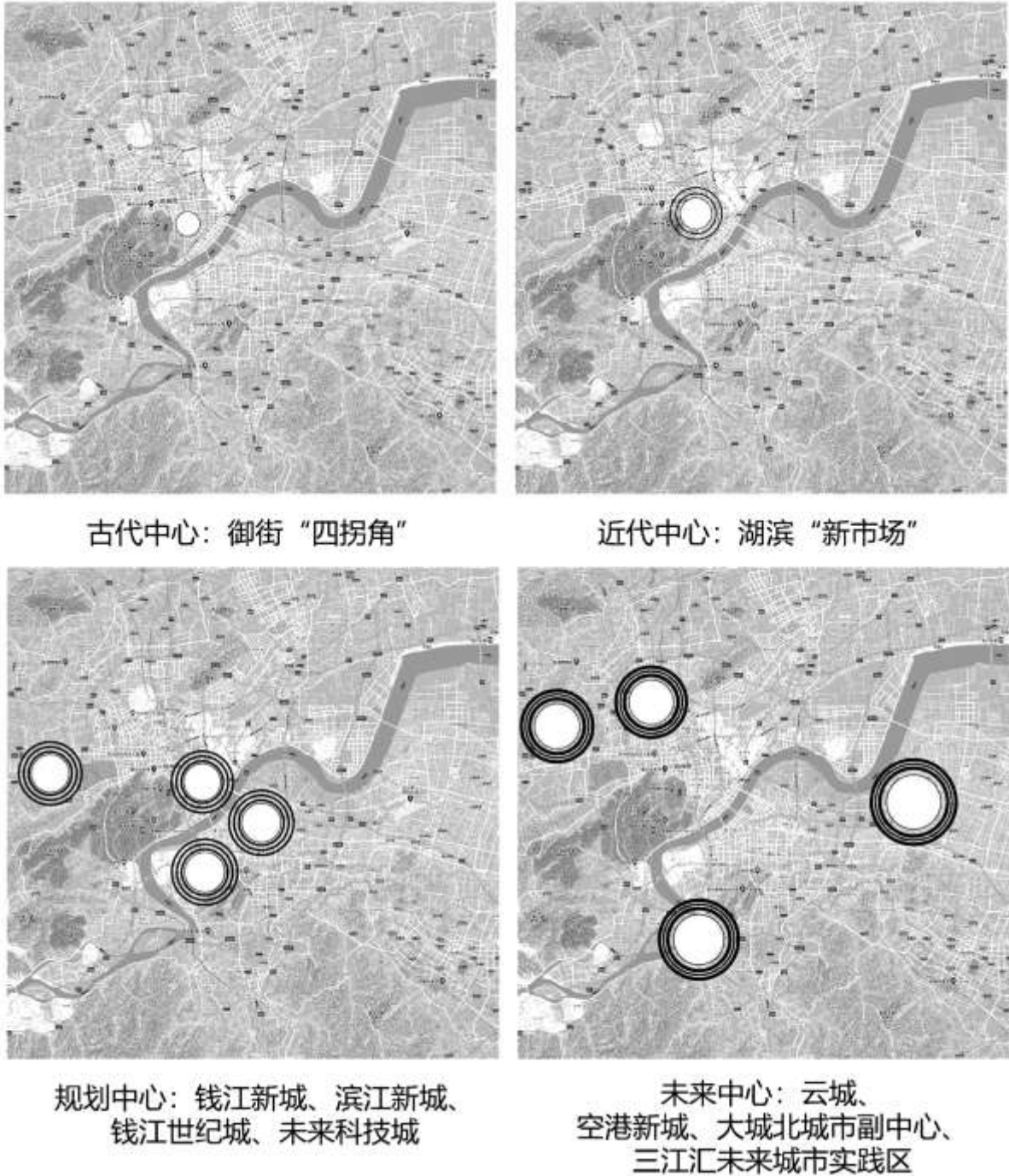


图 1 杭州城市中心变迁图

王艳侠:互联网经济或者说数字经济是今天大都市的主要经济形态。它给城市“多中心化”带来哪些影响?

---

马智慧:从“天堂硅谷”到“一号工程”,从建设创新型城市到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杭州成为一座互联网经济之都。杭州2019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3795亿元,增长15.1%,高于GDP增速8.3个百分点,占GDP的24.7%。高新区(滨江)、未来科技城等成为杭州城市新中心,均依托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互联网的泛在化进一步加快了杭州城市的“多中心化”。

王艳侠:互联网可以催生更多的城市新中心吗?

马智慧:城市新中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区位、空间、产业、服务、景观、文化等,都会影响新中心的建构。互联网有助于降低传统要素在城市中心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强化人才、科技、信息、服务等因素的作用,从而加速城市中心的形成效率。从这一角度看,互联网有助于催生更多的城市新中心。特别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城市中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形态、方式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传统中心大多停摆,“线上中心”陡然形成。

王艳侠:新中心的加速形成,是否会引起传统中心的“塌陷”?

马智慧:近年来,我一直关注老城“中心塌陷”问题。城市化一般规律表明,郊区化阶段前,中心城区是城市资源要素的集聚区、城市整体发展的引领区、城市竞争实力的核心区。郊区化到来后,中心城区普遍进入发展瓶颈期,出现首位度下降、集聚能力减弱、带动性不高、竞争力不强等现象,引发“中心塌陷”。数据表明,近年来,杭州中心城区人口、GDP、财政收入均增长放缓,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现象突出。随着财政支出的不断提高,中心城区即将迎来普遍的财政赤字现象。由于土地资源有限且可用空间碎片化,中心城区无法引进大项目、大平台,创新要素缺乏,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活力受限。

王艳侠:拥有巨大能量的互联网能否挽救城市传统中心“塌陷”的问题?

马智慧:从要素驱动角度来看,互联网经济是破解城市传统中心“塌陷”问题的关键抓手。数字赋能可以培育数字化现代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的商业应用,以及线上服务平台的形成,激活传统中心的活力,使面临“塌陷”的传统中心重新成为“新中心”。

王艳侠:TOD模式是形成城市中心的关键因素之一。杭州城市轨道交通目前规划已批复的线路有13条,里程516公里。其中,有10条普线,2条市域线,1条机场快线。目前已经建成里程数306公里,成为全国第9个“300公里+”城市。这对未来城市“多中心化”会产生什么作用?

马智慧:城市轨道交通是支撑TOD模式的核心基础设施。杭州地铁1、2号线未形成环线的原因之一是通过“人跟线走”,疏解主城区人口,并通过地铁站点TOD模式在新城实现集聚,形成新中心。今后,轨道交通重要站点的集聚能力还会进一步彰显。这一过程中,需要在建设用地供给方面围绕轨道站点安排增量用地,优先向具有新中心潜力的重点区块倾斜;站点周边用地优先向居住、公共服务等设施倾斜。可以预见,在重要轨道交通经过的区块,包括郊区和老城更新区,将进一步产生新中心。将TOD模式推广到“大TOD”概念,高铁西站枢纽所在的云城、萧山机场所在的空港新城等,都有望成为杭州未来的中心。对国内多数大都市而言,经历“主城-副城-组团”的探索,未来将更多以“主城+郊区新城”模式推动“多中心”发展,引导既有中心过密人口及产业,特别是新流入人口向郊区新城集聚。杭州也正在第五轮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一核九星”的特大城市空间格局。当然,未来新的城市中心数量或许还不止9个。

王艳侠:无论“多中心化”如何发展,人口始终是核心要素。近年来,杭州人口流入量大幅提升,但区块分布并不均匀。2019年杭州市新增人口55.4万人,余杭区占28.8万人,且集中流入未来科技城。这种现象会不会抑制“多中心化”趋势?

马智慧:人口流入是强化中心地位的关键因素。但随着某一中心人口和功能过密,自然会产生“疏解”现象。整体层面,杭

---

州因产业、生态、文化、生活环境优势，将进一步吸引人口集聚，总体上强化“多组团”格局。目前，杭州还有大城北城市副中心、空港新城、三江汇未来城市实践区、云城等待开发区域，可以大量容纳新增人口。巨量的新增人口将加剧不同区块中心间的竞争，使得组团之间此消彼长，或催生新的组团，从而使“多中心化”更具活力。

王艳侠:随着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点，将更多考虑品质的高低，个性化的诉求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稳固既有中心，引导新中心高质量发展？

马智慧:我非常赞同品质的重要性。城市中心并非规模越大越好，也并非越小越好，而是品质越高越好。教育、养老、文化、健康、休闲、生活服务等，是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稳固既有中心，就要补齐短板、提升品质。规划、培育、引导新中心发展，也应立足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生活便利，实现高质量发展。可以说，未来的城市中心，不以规模拼大小，只以品质论高低。

王艳侠:如何给未来的城市中心明确一个定义?或者说，建议将来的年轻人到哪里工作和生活？

马智慧:我们探索过资源快速集聚的开发区模式，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特色小镇模式，实践过西湖、西溪湿地、良渚遗址、大运河等大型文化生态集中区模式，目前正在探索未来社区模式。与工业化时代城市“规整”的布局不同，在“后工业化”时期和数字智能时代，城市的空间形态和产业链形态都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的资源积淀不断增多，“内在性原则”也随之增强，城市的价值依赖不再以产业为中心，转而以人为中心。数字智能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转变的迫切性和可能性，“产-城-人”的发展逻辑过渡到“人-城-产”的新逻辑。人在哪里集聚，哪里就有望成为新的中心。如此，生活归属和文化认同将成为一个区块发展的核心动力。如果要给未来的城市中心下一个定义，我认为，它是一个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公共服务集中、人文艺术氛围浓厚、交通较为便捷、生态环境优美、社会治理高效的高品质区域。

#### 参考文献:

[1][南朝宋]刘道真:《钱塘记》,[清]王仁俊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宋]潜说友纂:《咸淳临安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3][明]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尹晓宁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4]杨渭生:《吴越国时期的杭城建设》,《杭州(周刊)》2009年第8期。

[5]徐规、林正秋:《五代十国时期的杭州》,《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6]周复多:《论杭州城市功能的进一步调整与完善》,《现代城市研究》1995年第5期。

[7][美]西里尔·鲍米尔:《城市中心规划设计》,冯洋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8][美]保罗·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在哪里?》,高登·克拉克等编:《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刘卫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9][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

- 
- [10]杨振山、蔡建明：《国外多中心规划理念与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借鉴作用》，《国际城市规划》2008年第4期。
- [11]史北祥、杨俊宴：《城市中心区的概念辨析及延伸探讨》，《现代城市研究》2013年第11期。
- [12]虞震：《日本东京“多中心”城市发展模式的形成特点与趋势》，《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年第5期。
- [13]梁江、孙晖：《模式与动因：中国城市中心区的形态演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
- [14]周伟林：《全球化时代城市的转型发展》，《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
- [15]王林申：《“流”与“形”：大都市区外围城市中心的生成机理与规划控制》，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 [16]杭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杭州调查队：《2019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